

■文学·艺术研究

传奇的底色 写实的追求

——探析许地山小说《解放者》及《东野先生》

刘 贵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 要:《解放者》与《东野先生》是许地山后期的小说。它们的独特性在于,戏剧性的情节、拥有独特精神世界的人物以及浓厚的宗教色彩使得小说具有神秘的气息。同时,许地山又将关注的视点落在现实生活中熟悉的人物、题材、主题之上,关注并观照小人物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许地山的小说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是一种总括性、充满诗意性的创作。而小说传奇的底色下,是许地山写实的追求,也是他沉静、执著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 许地山; 人物; 情节; 宗教色彩; 写实; 人生追求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7)09—0118—04

PDF 获取: <http://sxxqsfx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9.026

Romantic Color and Realistic Pursuit—An Analysis of XU Di-shan's Novels of *The Liberator* and *Mr. DongYe* LIU Gui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Liberator* and *Mr. DongYe* are Xu Di-shan's novels in his later stage. The two novels are mysterious with dramatic plots, unique characters and dense religious color. Xu Di-shan pays attention to the familiar characters, subjects and themes in the real life at the same time and focuses on the spirit world of the common people. Xu Di-shan's novels are comprehensive and romantic by surpassing time and space. In fact, Xu Di-shan's novels are realistic under the romantic color. It is a portrayal of his inflexible pursuit of life.

Key words: XU Di-shan; religious color; truth; pursuit

《解放者》和《东野先生》均是许地山后期的小说,相较于前期宗教气息浓厚的小说,许地山逐渐将笔触投放到了国内战争背景下小人物的生活之上。杨义将许地山小说创作的变化称为:“在为人生宗旨下转向现实主义”。许地山后期的小说更关注平凡人物的生活、命运,并对战争、革命等做了独到的分析。但他的小说,不论是从情节、人物独特的精神世界还是由显在的宗教环境变为隐秘的宗教精神来看,都使得小说具有神秘的气息和传奇的底色。一方面,小说的神秘色彩有助于揭示战争和命运对人的双重拨弄,表现平凡人物的坚韧和执著;另一方

面,传奇底色使得许地山的小说不同于其他描写革命、战争的小说,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许地山的宗教哲思、对命运的思考、对人生的冷静凝视,最终内化为小说人物理性、执著的人生追求。

许地山后期的小说,在保留前期部分传奇色彩的同时,注入了更多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内蕴着一种更加旷达、冷静的人生追求。这种转变体现了许地山由关注“怡情文学”走向“养性文学”的选择,反映了他对现实、战争的关注,也体现了许地山对文学与生活的看法。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坚守文学的艺术性,最终以文学的美观照生活,以“教读者能把更坚

定的性格培养出来”^[1],这是《解放者》和《东野先生》最大的价值,也是许地山小说的最大价值。恰如茅盾评价的那样,许地山的小说“外表的浪漫主义风度之下,有一副写实的骨骼。”^[2]实际上,许地山是典型的以传奇之笔写真实人性、人生的作家。他将文学与人生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既保留了文学的艺术性又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对人生的严肃思考。

一、传奇的底色

《解放者》和《东野先生》的独特性首先在于许地山写出了平凡人物的独特性。小说中人物的思想、性格、精神世界均是独特的。《解放者》中的人物均是来自生活中的小人物,例如便衣警察、女教师等。但这些小人物,如《解放者》中的便衣警察绍慈,碰见刚出生的羊羔便生怜悯之心将其带在身边喂养。《东野先生》中的梦露,更是特立独行,“他底思想和言语有时非常迂腐,性情又很固执”^{[3]264}但他又能发出“做饭不一定是女人底事”^{[3]275}这样新奇的言论;他因鞋把脚趾头夹得很痛便把鞋头的皮割开,并说出鞋迟早要坏的道理;他喝牛奶必须连瓶子一起买且堆在书房直到堆不下才清除等等。小说人物身上这些奇妙的色彩使得平凡的小人物栩栩如生,各有特色。

许地山没有简单地将革命者描写成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而是借用人物身份的独特性为革命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例如,《解放者》中的革命分子契默是个和尚,他具有身份和性格的双重复杂性。陈邦秀曾被叔叔卖掉做了女仆,后来成为小学教员,她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者。许地山的小说没有直接描写革命活动及战争场景,而是以游离的视角,即,以非革命者的视角观察革命人物、革命活动。革命者身份的神秘性使得革命具有了神秘的色彩,许地山以此从侧面反映革命的复杂性。

许地山小说的传奇色彩还体现在小说情节具有异乎寻常的戏剧性、传奇性。但这种传奇性并非类似其前期具有隐喻性的传奇故事,而是与“命运无常”的人生主题直接对应。许地山在《缀网劳蛛》中曾借尚洁的话表达了他对命运的看法:“后一小时的事情,我们也不敢说谁知道,那里能顾到三四个、三两年那么长久呢?”^[4]故事的转折之处尽现命运的不可预测性。《东野先生》中的陈邦秀本是受尽女主人虐待的小女仆,她在小绍慈的帮助下逃出主人家,后因勤快本分成为绍慈的老师陈老师的养女。之后,她参加了革命活动。戏剧性的是,少爷绍慈一家在革命风暴中成了受害者,绍慈虽大难不死,但因生活所迫做了便衣警察。绍慈偶然得知陈邦秀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儿时伙伴,却因太过激动导致错失了相认的良机。陈邦秀被捕后,绍慈前去营救,陈邦秀因绍慈的警察身份产生误会,设法逃走,绍慈在寻找

她的过程中溺水而死。

《东野先生》在两条主要线索的推动下展开。一是围绕梦鹿寻找他的同学雁潭展开;二是由梦鹿妻子志能的情感选择展开。当梦鹿惊喜地发现他寻找的同学雁潭就是他收养的革命遗孤延禧的亲人时,却听到妻子被害的消息。巧合的是,被警察打死的是与志能同名的革命者。志能逐渐发现自己与梦鹿的理想、选择相一致,她理清了与卓先生的关系,当她赶回家时,却发现梦鹿已被警察打成残废。志能的选择与梦鹿的遭遇产生了讽刺性的效果,使小说具有传奇色彩。志能与卓先生在一起固然受外国所谓开放风气的影响,但梦鹿却在固执守旧的名义下对她和卓先生的交往充满包容和信任。在志能眼里,梦鹿胆小怕事,但当他误以为志能被害时,不顾危险寻找“她”的尸体,最终被打成残废。

绍慈和梦鹿除了受命运的拨弄,最终还因战争的因素丧命。小说情节看似有多重巧合,但从整体上来说,小说的情节环环相扣、因果相循。陈邦秀因绍慈身份产生的误解造成的悲剧等使得小说具有戏剧性,同时也展示了人在强大命运面前的渺小,而命运的不可预知性和人的不妥协性正是许地山小说传奇性的张力所在。小说的情节虽然充满了偶然性,但从更长远角度来看,这种传奇色彩恰好对应了人生中种种不可预知的因素。况且,在战争背景下,人的命运更加坎坷。许地山既没有夸大革命的作用、规定革命的性质,也没有片面否定革命,而是将特定时期中的革命放在恒久的命运中考量,使得故事的戏剧性和传奇性跳出虚构性的限制,具有了观照现实的力量。

许地山的小说始终贯穿着“爱”的宗教主题,这为小说涂抹上传奇的色彩。他认为:“人的行动,若仔细分析,少有不合宗教色彩的。”^[5]陈平原指出,在许地山后期的小说,例如,《解放者》、《东野先生》、《春桃》中,“宗教由外在的宣扬变为内在的感情体验,并通过行动自发地表现出来。”^[6]《解放者》中的绍慈看到羊羔都会生出怜悯之心,对落难的陈邦秀更是全力营救;《东野先生》中的梦鹿收养、教育革命遗孤,救助同学雁潭的亲人,对妻子更是敬爱、信任,他的一举一动都体现了“爱”的宗教主题。

“多苦观是佛教的中心思想,它将人生视为苦难的历程。”^[7]许地山在《序〈野鸽〉的话》中也表明,人类的压迫是普遍的事情,他指出最大的压迫是自然的势力,用佛教的话说,是“生老病死”。在《解放者》中,作者通过狼和羊的生存状态暗喻人在命运面前的渺小。小说中“幸则生,不幸则死”、“生死多是不自立、不自知的”的总结反映了许地山对命运的看法。《东野先生》中,雁潭一家人的遭遇充满了苦难的意味。雁潭病死,妻子带发修行,弟弟参加革命殉难,妹妹翠环婚后被骗被卖,母亲伤心过度眼睛失

明。可见,人生是个苦难的历程。无论是“爱”的主题还是“人生多苦”的观念都使小说具有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总的来说,许地山小说传奇性的落脚点在于,许地山通过小说展示了苦难的不可消灭性,战争对人造成的伤害,以及命运的不可预知性。许地山注重小说的艺术性,同时也关注如何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打动读者。《解放者》与《东野先生》中的传奇色彩使得它们有别于同一时期的革命小说。在小说的浪漫底色下,暗含着许地山写实的追求。

二、写实的追求

许地山小说中的人物多为平凡的小人物,这些人物主要来自城市。《东野先生》中的小学教员梦鹿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缩影,留过学但依然热爱传统文化,穿着打扮与生活习惯介于传统与新式之间。志能和卓先生象征着部分留洋回国的学生,他们回国之后住不惯客栈,习惯了西式的礼仪,说中国话有洋人的语气,崇尚自由恋爱。《解放者》中的绍慈是城市里混生活的便衣警察,陈邦秀是个小学教员,同时也是革命分子。许地山小说中的人物不多但都具有代表性,他们均来源于生活,是许地山较为熟悉的人物。

许地山前期的小说在当时被称作“夫妻文学”,足见他对爱情主题的重视。《东野先生》和《解放者》虽然没有将爱情作为主线来写,但爱情主题在小说中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爱情本身而不是爱情与战争关系的探讨体现了许地山对小人物爱情生活的关注。《东野先生》中的爱情有正反两面,正面是梦鹿对妻子的感情,是一种相敬如宾式的传统爱情。梦鹿尊重志能,没有将她当作家庭主妇对待,在私人生活和事业上给她充分的自由空间;他信任妻子,对妻子和卓先生没有怀疑更没有嫉妒。当他误认为妻子受难时,不畏艰险去寻找妻子的尸体,最终被打成残废,可见梦鹿的爱情是不计较付出的。反面是卓先生与志能的感情,卓先生将志能的爱情比作她脸上的粉,“敷得容易,洗得也容易”,以此讽刺志能游戏爱情的态度。

相比爱情,许地山更注重亲情。他认为:“爱父母的民族底心地是‘生’”,“生是相续的”。实际上,对亲情尤其是对父母感情的重视体现了许地山的传统情怀,而亲情主题一直以来都是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在《东野先生》中,许地山对雁潭的母亲与妹妹慧儿相依为命的情景作了细致的描写。慧儿为了养活哭瞎眼的母亲,除了做活计还要为她和母亲所住的小破屋的主人打理花园。当梦鹿寻访雁潭时,正碰上慧儿将花生全给母亲,自己将空花生壳捏得噼里啪啦地响,骗母亲自己也在吃花生。慧儿与母亲的艰苦生活反映了战乱中人们的艰辛与不幸,同时

也体现了亲情的珍贵和永恒。

《解放者》和《东野先生》均选取战争作为小说的背景,与前期异域色彩浓厚的小说相比,战争背景体现了许地山对现实的关注。《解放者》围绕绍慈营救革命分子陈邦秀展开,陈邦秀与契默和尚的对话,侧面展示了革命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投机分子对革命的利用和破坏,反映了革命的复杂性。在《东野先生》中,许地山借东野先生的比喻表达对革命的独到看法,并区分了革命中准备和行动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地山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不是革命分子,而是以非革命者的身份观察革命活动、革命者。因此,小说对革命的描写和判断带着较为中性的色彩。

除了革命素材,小说还描写了革命背景下小人物的苦难生活。例如,在《东野先生》中,街上卖馄饨的小贩将老鼠肉剁碎做馄饨馅。当梦鹿确认了他的生活境况后,没有报官反而救济他,这段小插曲反映了战争背景下小市民的艰难生活。小说中也没有对农民和农村革命的描写,许地山重点刻画战争对人造成的影响,这与许地山的写作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作者如果是真诚底话,一定不会放着他所熟悉底不写,反去写他所不知底。”^{[8]829}许地山坚守了他的文学追求,写他熟悉的生活、熟悉的城市人物以及他眼中的战争。许地山的小说虽然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但他的小说本质上是对现实的关注。

综上,许地山的《东野先生》和《解放者》虽然具有传奇的底色,但无论是小说的人物、小说的主题还是小说的题材,都来源于许地山熟悉的生活,体现了他对现实的关注和对平凡小人物的现实观照。战争的残酷和农民的反抗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方面,而平凡人物在战争和命运的双重拨弄下的惨状同样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方面,而许地山更关注后者。许地山意在通过小说的传奇色调展示更为真实的人生、人性,这些均体现了许地山的写实追求。从表面上来看,许地山的小说充满了浪漫的色彩,但实际上,他借奇特的笔法对人生展开更为严肃的思考。

三、执著、韧性的人生追求

许地山小说的这种特色本质上是其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解放者》与《东野先生》从整体上都呈冷色调,许地山在《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中指出:“文艺的创作就是用心描画诸世间底事物。冷热诸色,在画片上本是一样地好看,一样地当用。”^{[9]802}小说的冷色调一方面与许地山指出的“人生多苦”观相呼应,另一方面,冷色调绘出的人生更能打动人心,引起读者的同情、反思,甚至有利于读者坚韧性格的培养。小说中用心描画的冷色调,反映了许地山对人生的理性审视。

在《缀网劳蛛》的开头,许地山将人生比作万花

筒。我们也可以将他的小说描写出的人性比作万花筒。自然,许地山小说中的人性万花筒由冷笔触勾勒而成。具体体现在:许地山小说中个别人物的性格具有复杂性。《解放者》中,契默和尚亦善亦恶,无情却也有情。在陈邦秀讲她的悲惨经历时,“契默像没理会那惨事,还接下去问:‘那方少爷也被害死了么?’”^[10]当绍慈向他打听被捕的陈邦秀时,他便想着利用绍慈到县里去营救陈邦秀。最后,当他得知绍慈溺水而死时很伤感,留下同情的眼泪。抛开和尚的独特身份,契默对他人的苦难既冷静又动情;对人既利用又相救。当然,他的复杂性格与当时的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他的性格不能用单一的善恶来概括。

许地山小说中有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从整体上构成了小说人性万花筒的另一个层面。《解放者》中的绍慈是善良的,对人、对事都充满悲悯的情怀;陈邦秀对生活充满绝望,想一死了之。对革命事业,她公私分明,她对绍慈的帮助始终充满感激;陈邦秀的丈夫世雄胆小、贪婪,毫无担当,他投机钻营,为了私利阻碍革命活动。《东野先生》中的梦鹿既善良又执著,既守旧又求新,他将收养的孩子视为己出、用心培养,对待朋友的亲人,也能尽心帮助;志能多情善变,无论是对待感情还是对待革命,都充满了变数;慧儿善良、坚韧。许地山没有刻意渲染小说中的人物,也没有对他们做出直接的判断,而是尽量将他们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力求“把人性在受窘压底状态底下怎样挣扎底情形写出来”^{[9]802}。

许地山对人生有着悲悯情怀,他曾说:“我所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命运。”^{[8]828}许地山的小说具有浓厚悲剧色彩,但它不同于“将美好的东西打破给人看”的悲剧,他并没有为了“给人看”而“打破美好”。许地山小说中的悲剧是他的“人生多苦”观与文学追求相互作用下的结果。许地山认为:人必然经受命运的洗礼,面对苦难、经受苦难是人生的常态。但是,许地山小说中人物经受的苦难,并非人为,也非许地山刻意为之,而是各种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许地山对文学冷色调的选择和应用并非用来渲染苦难,而是更好地呈现复杂的人生样态。对于许地山来说,对“不道德的事”的描写必须使读者“见不肖而内自省”,才算成功。作者的功能“便是启发读者这种悲感和苦感,使他们有所慰藉,有所趋避。”^{[8]828}可见,许地山既不是为了“打破”而写“苦难”,也非为了“展示”而写苦难。许地山在小说中描写苦难,是为了使读者获得某种程度的理性的认识和力量,在无法逆转的命运巨轮下更好地适应生活。问题是,许地山小说试图解决的问题高于当时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战争和生活问题。例如,他描写战

争的小说,战争在小说中被缩小让位给了更大的命运主题。许地山以永恒时空中得出“美”与“爱”的人生观、价值观来观照当下,无法解决战争中人们迫切关注的生存、自由等问题。

但同时,许地山的智慧恰恰在于他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从永恒的时间、空间中审视人生和命运。因此,他的小说能超越时代的限制,获得更长久的价值。相较于当时的战争来说,他更关注永恒时空中的人性和命运问题。在战争时期而超越战争,在有限的生命之中窥破永恒的人生问题,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许地山的小说能获得读者的长久共鸣。他的小说是一种超越性、总括性、充满诗性的创作。小说的情节、人物的精神世界、宗教色彩呈现的独特性是其小说显在的传奇性,而传奇诗性的人生哲思是其隐在的传奇性。在小说传奇的底色下,内蕴着许地山对人生的热切关注和他沉静、执著的人生追求。

许地山小说最终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人生、命运。他对人性的冷静凝视,对命运的客观认识并不是顺从和逃避,而是对人生、人性做了充分的认识后,以一种更完满的心态、人格、方式去面对生活,更好的适应生活、改变生活、创造生活。许地山的《解放者》和《东野先生》都追求一种完满的人格。梦鹿和绍慈都有仁慈、包容、理解的智慧之心,冷静看待人性、命运,不盲从、不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是以自己的执著、善良影响他人,在困境中坚守自我,寻求一条更稳妥、智慧的人生出路,这便是许地山的小说想展示给读者的东西。

[参考文献]

- [1] 许地山. 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C]//高巍选辑. 许地山文集(下).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831.
- [2] 茅盾. 论许地山的小说.[N]. 香港大公报,1941-09-21.
- [3] 许地山. 东野先生[M]//姜德铭主编.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
- [4] 许地山. 缀网劳蛛[M]//姜德铭主编.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150.
- [5] 许地山. 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C]//高巍选辑. 许地山文集(下).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626.
- [6] 陈平原. 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03):1-26.
- [7] 张慧佳. 论许地山的文学创作与宗教文化精神[D].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 [8] 许地山. 序 <野鸽>的话[C]//高巍选辑. 许地山文集(下).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9] 许地山. 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C]//高巍选辑. 许地山文集(下).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10] 许地山. 解放者[M]//姜德铭主编.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241.